



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熊安娜

近日，著名学者张求会推出“陈寅恪四书”，引起关注。书中披露的新史料与学术争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了新路径。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中，谈及陈寅恪研究现状及相关热点话题——

“一字不苟”才对得起陈先生

本人也是这样一种认真细致的研究风格。我个人理解，陈先生的一字不苟既是爱惜羽毛的体现，也是努力提升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的追求没有那么高，这四本小书的注释之所以非常多，一是为了尽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二是便于有需要的同行可以对材料进行“覆按”。我希望能够让普通读者信服，让学界同行放心引用。当然，这样做做有时难免显得拖沓、啰唆，可以说有利有弊吧。

羊城晚报：您当年是怎么走上陈寅恪研究道路的？

张求会：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想要写他的年谱，由此也开启

了对义宁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关注。1996年、1997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陈三立与谭嗣同》和《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随后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做些小文章，即便不是直接研究陈寅恪，也和他密切相关。

羊城晚报：开始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大致的研究路径？

张求会：没有明确的设定。我是从陈寅恪的家族史开始学术研究的，一直比较多地关注陈先生的生平行迹、家族背景等。这么多年获得的所谓“成果”，包括新出的这四本书，平心而论，更多的还是外围研

究，还没有进入核心地带。原因之一是我对史实考证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所谓“治史如探案”，特别对胃口。另一个原因和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近代史接触相对较多，但对于陈先生擅长的中古史就十分陌生，对于陈先生在其他众多领域的杰出成就更是望洋兴叹，不知从何入手。“陈寅恪四书”里收录的《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考释》，虽然也在触碰敦煌学研究，但毕竟还只是触碰，做起来也很吃力。今后要将外围研究与内核研究同步进行，也就是说，不放弃对于陈先生生平、交游的关注，也要加大对陈先生最核心的学术成果的学习、研究。

关于陈寅恪的“疑点”还有很多

于陈寅恪的“疑点”还多吗？

张求会：仍然还有很多。“大端”我没有发言权，还是就我感兴趣的“细节”来说一说。我在江西南昌和读者进行新书分享时，当地就有一位记者问我：“陈寅恪在南昌生活了一年多，那么他在那里读书呢？”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想过。陈家在戊戌政变后回到南昌，陈寅恪当时九到十岁的年龄，正是发蒙念书的时候。陈家那时生计艰难，能不能解决六七个孩子的读书问题，确实值得怀疑。此外，央视一个摄制组正在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陈寅恪》，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执行导演突然问我陈寅恪两次去日本留学的具体情况，也把我问得一愣一愣的。回到家查了查资料，还是无法回答，只好说仍然找不到原始文献。我们经常说知人论世，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都了解不清，相关的判断、结论能否立得住脚就是个问题了。就此而言，我才会说对陈寅恪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

羊城晚报：您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这么一个人，难道一辈子就“钉”住陈寅恪一个人吗？

张求会：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所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陈先生就是“谜一样的大神”。再说了，陈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通过他的朋友圈，可以辐射到漫长历史、众多领域的万千世界。下僧陈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顺着下先生这话，毫不夸张地说，“陈寅恪研究”做不好，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很多领域的研究必然大受影响。

羊城晚报：总体上您是怎么评价陈寅恪先生的？

张求会：陈寅恪是一位杰出的

对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抽离感

陆键东认为，目盲无情阻碍了《柳如是别传》“这部已具非凡品格的著作有可能达到它原就有深厚积累支撑它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当然，人类在AI面前并非完全处于下风，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的想象力和同理心还是最大的优势。在这两点上，陈寅恪先生堪称翘楚，稳稳地居于超出平均水平甚高的段位。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学者或学术研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有有意无意地放大、抬高，您对此是

怎么看的？

张求会：我觉得既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进不去，没有办法和研究对象共情，所得结论未必靠得住；出不来，又有可能完全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以其是是为，以其非为非，所得结论同样靠不住。不可否认的是，陈寅恪在相当广阔的领域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他又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很多时候连普通人的健康、健全都无法拥有。二者如此矛盾，越发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下僧

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思想的学问家。简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精神，其次是思想，最后才是学问。

羊城晚报：做陈寅恪研究的人有不少，其中也有您的朋友，你们之间的相互评价能否做到客观公正？

张求会：我们常说一句话：“对事不对人。”但是谁都知道，事是人做的，而且是具体某个人做的，评价某件事其实是在评价某个人，至少在当事人那里就会这么看。不过，肯定别人也好，批评别人也好，关键还是两个字——事实。只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对方就算当时不开心甚至很反感，但是冷静之后，也还是会接受，因为被批评者才是受益最大的人。我认识的同行，绝大多数都能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没有这种量量，可能也不适合做学术研究吧。

慧称颂他的话——“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痼癖在抱，常怀干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绝非私阿之言，而是天下公论。

大神一样存在的一个。陈寅恪是人，不是神。我在“陈寅恪四书”里也写了好几件陈寅恪很世俗化的事情，根本不会矮化他，反而会更好地丰富他的人生面相。对研究对象带有感情，可以理解，但要适可而止，必须保持必要的抽离感。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要警醒。

陈寅恪的后世相知

□李怀宇

1933年12月17日，陈寅恪致信陈垣：“此君（岑仲勉）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这不过是二陈之间的知己闲话，却余韵无尽。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陈寅恪身后的“义宁之学”，蔚然成林，而以岭南为盛，近日出版的张求会“陈寅恪四书”更是别开生面。

张求会以研究《陈寅恪家史》起家，三十年沉潜而成四书。《徐生流转》着力记载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古调犹弹》发掘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世外文章》是陈寅恪集外文钩沉；《尔尔区区》则是“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蒋天枢曾用“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来概括老师陈寅恪的一生。张求会书成自述：“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安慰、安抚陈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在替许多人努力完成早该完成的救赎——毕竟陈先生一辈子最屈辱、最痛苦的事情确实确实发生在康乐园。”

陈寅恪的诤友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张求会的“陈寅恪四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尽可能地获取和解读关于陈寅恪的史实。

书中关于陈寅恪的身后事，让我最感温暖的是《陈寅恪、唐贤胥友安葬侧记》。人性的纯良在这里又一次发出光芒。而画家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却心愿。这一点是我前所未知的。我曾多次采访黄永玉，也去过两次“万荷堂”，所谈皆是书画文章。如果早知黄永玉这一“侠义”之举，当可问出更多妙语。黄永玉在陈寅恪、唐贤夫妇永眠之地书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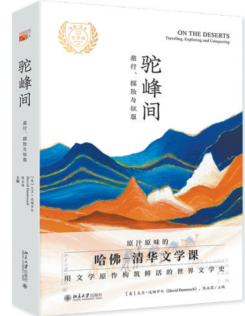
《古调犹弹》中，六位学人的日记富含史料。夏鼐日记中尤多猛料。1937年4月1日记：“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颇得《世说新语》之妙。1947年10月23日记：胡适对陈寅恪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再与胡适日记互证，可见那一时代气象。而刘节1966年9月26日记：“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可知刘节确是“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

陈寅恪说：“依照今日训诂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世外文章》可作此说的旁证。而《尔尔区区》亦可作一部“陈寅恪研究”文化史观之。张求会认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又谓：“对于好书，求全责备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好书才当得起这样的重视。”后世对陈寅恪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学术史上，有人和陈寅恪同调，有人向陈寅恪异异，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睬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诗云：“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先生的背影渐渐远去，而后世文化托命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陈先生而见世界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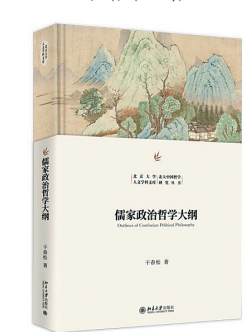
出版书单

《驼峰间：旅行、探险与征服》
大卫·达姆罗什[美]
陈永国 主编



本书的核心是前现代时期旅行与讲故事的交织——经典的历史游记和虚构游记作品汇集在一起，由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作序，清华大学教授陈永国逐篇作导读。

《儒家政治哲学大纲》
千春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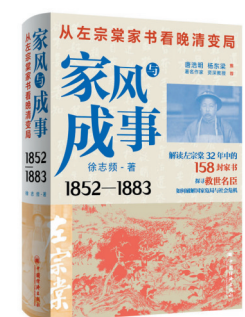
本书不仅是在北大开设的儒家政治哲学课程的成果，更是经过多年的思考与沉淀，长镜头全景厘清儒家政治哲学关键词，照见儒家政治哲学在张力与冲突中穿透历史的思考深度。

《看见最早的绘画》
罗曼·佩古奥[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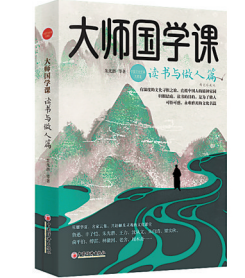
法国著名的拉斯科岩洞，是史前艺术重要的圣地之一。本书通过大量精美图片呈现了该岩洞主要的岩画，解释了其可能具有的实用、文化或宗教意义，以及与古人生活的关系等。

《家风与成事：从左宗棠家书看晚清政局》
徐志频 著



本书以左宗棠写于咸丰二年至光绪九年的158篇家书为线索，结合以正史、笔记、方志记载，再现左宗棠的传奇人生。以管窥豹，从中解构晚清政局与社会，直探国难危机根源，同时品读成大事者的韬略与格局。

《大师国学课：读书与做人篇》
朱光潜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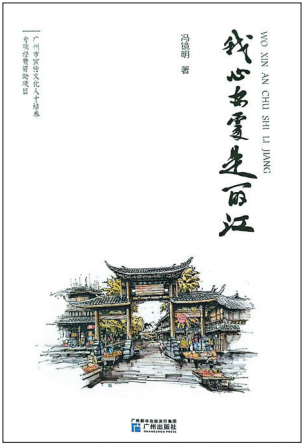


精选朱光潜、丰子恺、梁实秋、沈从文、林徽因、王力、朱自清、俞平伯、傅雷等名家谈读书、谈做人、谈诗论文、谈修身养性的名篇，从中能看到他们的个性、成长、读书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智慧。

书中有丽江的历史文化和风情，更有纳西民族的灵魂

□赵洁

此心安处，是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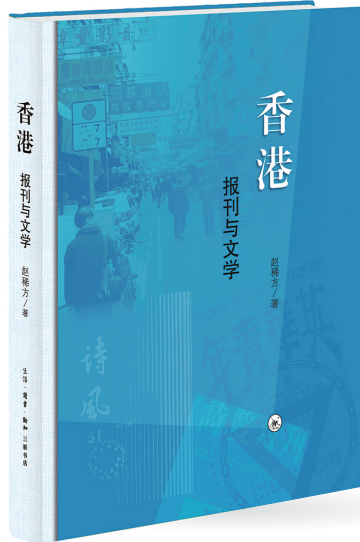


收到老同事冯镜明快递来的新著《我心安处是丽江》。初相识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同事，但同行，偶尔在采访或饭局中会碰到。在满桌记者高谈阔论国际形势或国内新闻的时候，只有他会和一直做副刊的我聊文学。其实我很少在公众场合和别人聊写作，毕竟写作是一件非常私人且小众的事，就算是在新闻圈也很少人关心。但冯镜明不一样，他并不是副刊记者，却对写作和文学有一种执着的关注和热情。后来，我们成了同事，能凑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起来，才知道他一直坚持笔耕，除了采写新闻稿件之外，还喜欢散文创作。

以原始文献为基础，亦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唐弢先生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做出个人独到论断这一学术传统的承继

□何夕

从“想象香港”到“实证香港”



《八方》《香港文学》等当代香港报刊。该书以赵稀方先生十余年来深耕香港文学期间汇集的资料为支撑，同时也展示了他自2019年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的最新成果。

《香港：文学与报刊》不仅涉及不常为人注意、但具有一定规模的《小说星期刊》《红豆》等刊物；还留意到《铁马》《岛上》等旋起旋没的小刊物；对于在既往研究中被贬抑为新文学对立面的《文学研究录》等旧体刊物及《经纪日记》等通俗面向的报

刊文学作品，赵稀方先生也予以重视，凸显了旧体、方言、通俗文学在香港地区所特有的凝聚华人族群、强化文化认同的价值。鲁迅在1927年发出的香港“无声”之论，当然是指向香港新文化生长的迟滞、新文学的喑哑无声，然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香港文学仿佛都难以摆脱“无声”论的阴影。透过《香港：文学与报刊》对大大小小的香港报刊“来路”与“归途”的追溯，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香港作家为撕去“文化沙漠”这一标签做出的不懈努力。另外，《香港：文学与报刊》不仅为研究近代以来的香港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方法，也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反思与破解近代以来生成的以西方为标尺的现代性逻辑颇有助益。

在《香港：报刊与文学》所用原始文献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此前未曾见于内地香港文学论著中的稀见材料，厚重的著述来自细水长流的积累，为了搜求文献，港大特藏室、港中大香港文学特藏、散落在香港市井的一间间旧书店……都留下过赵稀方先生取原报刊及相关资料的身影。若无对于学术的无限深情，又如何能在原始文献一难求的情况下，二十余年如一日地坚持香港报刊文学研究。

赵稀方先生在本书后记中写道：“写作《小说香港》的时候，我还年轻；出版《报刊香港》，头发已经白了。”“好在在香港文学研究，我总算有始有终。”作者淡然，读来却让人不免动容。